

往事波澜

吴柳斯



粤侨丛书

往事波澜

吴柳斯

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

1992·广州

92 粤印准字第 440 号

华侨丛书

往事波澜

吴柳斯

*

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编

轻工业部甘科所印刷厂 内文印刷

广州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印刷

粤港信息日报电脑车间 植 字

787×1092 毫米 32 开 6.76 印张 130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自序

我是侨生。出生于原英国殖民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怡保埠一个贫穷的割胶工人家庭。父母亲原是农民，皆因家乡政治腐败、经济凋零、民不聊生、不堪地主剥削压迫，而于清末年间，当契约华工，离乡别井，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当时，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发财的美梦。可是财神爷对他们太不公平、太残酷了，从不发半点怜悯之心，予以丁点照顾，却使他们受尽殖民地胶园主、资本家的剥削，尝尽人生苦汁，长年累月过着失业威胁，朝不保夕，手停口停，毫无保障的贫困生活。其结果不但发财美梦、美好生活憧憬，均成泡影，甚至连回家乡的盘缠也挣不到，落到个一去不复返，病逝南洋，身葬异国，永别梓里的悲境。

南洋华侨向来重视子女文化教育，虽穷也想法让子女上学。我父母也不例外，省吃俭用支持我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上侨校读书。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坚持每天清晨三、四点钟起床帮助双亲干完割胶的活，然后上学的艰辛岁月，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我读书那年代（二、三十年代），马来亚华侨捐资兴办的侨教事业，已相当发达，但只办到中学，没有创办大学。我有幸在怡保华侨捐资创办的最高学府——

育才中学完成中学的最后课程后，于1934年下半年开始踏上谋生的征途。

南洋是个商业社会，我没有选择从商之道，选择了从文之路。1940年我进入报界之前，从事侨教工作五年多，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翌年二月在新加坡参加抗日革命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自此我没有离开过革命队伍，而且进入报界后，一直坚持以新闻工作，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

回顾我从1936年，正值马华新文学低潮期行将过去，马华抗战文学运动兴盛期跃起前夕，在马华文学界老前辈的培育、鼓励下，开始学写作，向侨居地华文报刊投稿。迄今半个多世纪，除在日占领时期和被英殖民地政府拘禁集中营以及在“文革”期间外，我一直断断续续写我想写的东西，即使在离休后这六、七年间，也未搁笔。

我不能称之为作家，是个记者和爱好写作的业余写作者吧了。我既写散文、通讯、特写、游记、杂谈，也写经济评述，工作经验之谈之类的文章，都是些杂碎之作，既无成功的代表作，连精品也难评上几篇。但我自以为我的拙作，是有益无害的。

我一向有把自己发表的文章剪贴保存起来的习惯，可惜都因灾劫而失散。第一本失散于日占领新加坡期间，第二本失散于1948年在新加坡被捕关禁集中营期间，第三本则失散于“文革”期间。“文革”后我不但继续剪贴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还到省、市图书馆、报社资料室翻阅旧报刊合订本，找回部分失散旧作，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海外文友协助找回几篇战前和战后所写的旧作。我对这些劫后失而复得的旧作，爱

之若宝，十分珍惜！

我之所以珍惜这些旧作，除因其失而复得，难能可贵外，更由于这些旧作是我数十年从事新闻、文化事业的历史足迹，是我追求进步的思想印证。年逾古稀，得以重阅旧作，感到无限欣慰。回顾当年在革命前辈指引走过的道路，是光明正确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大浪潮中，我虽没有作出巨大的贡献。但在历史大变革的激流中还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而未被淹没于狂风恶浪之中，更不致随波逐流，为时代所唾弃；在文化百花园中，我虽是个低能而又笨拙的园丁，栽不出鲜艳的花朵。但我却没有偷懒，也没因而动摇、气馁、搁笔不写。

《往事波澜》这本小集子，是我近年来找回失而复得的旧作和离休后写的新作的剪贴本。包括有歌颂马来亚人民在抗日时期，与敌英勇斗争的篇章；有缅怀带路人的纪念文；还有经济评述、提倡社会主义新风的杂谈和新闻出版工作杂记等杂篇。这些文章，虽远远够不上上乘之作，且定必有谬误之处，但我想其中也会有可读之作，所以在朋友的鼓励下，敢于把它刊印成集留作纪念，并供内部发行，赠送友人存念。谨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1992年8月1日于广州

目 录

自序	(1)
访抗日军	
生与死的角逐	(1)
——一幕冲牢记使命	
煤炭山工人的抗日斗争	(8)
沙盖民族——抗日军的忠实朋友	(15)
狮城纪游	
重游新加坡	(20)
新加坡散记	(26)
新加坡散记续篇	(30)
崛起的新加坡	(34)
新加坡的“大难馆”	(42)
祝愿与杂忆	
战友的祝愿	(46)
珍惜成就 再创新功	(49)
浅谈报业经营管理问题	(52)

海外报业生涯杂忆 (60)

回忆故人

从《南洋商报》到《风下》	(69)
胡愈之与海外盟组织	(73)
郁达夫逃难及失踪	(78)
忆逃亡在苏岛的郁达夫	(95)
爱国归侨作家陈如旧	(101)
巴人在南洋	(118)
陈嘉庚与怡和轩	(120)
缅怀战友曾艾荻	(122)
缅怀李维纲老师	(126)
无私无畏 奉献一生	(130)
悼念报人梁若尘	(133)

小议论

一位海外朋友的感喟	(136)
告诫撕报者	(138)
让“笑意”更浓	(139)
廉正与兴业	(141)
从根本纠正	(143)
老年人的忧虑	(145)
一代青年人的风尚	(147)
卫生非小事	(149)
南洋客的收获与建议	(151)
这里也是门面	(153)

经济述评

新侨汇的技术问题.....	(155)
解放区生产的发展.....	(159)
从开歇业看广州之商业好转.....	(164)
在稳定发展中的运输事业.....	(168)
私营企业发展有了进一步保障.....	(176)
易货贸易为什么要先进后出.....	(180)
工商界应大力发展联营事业.....	(185)
面向全国搞好物资交流.....	(192)
申请进口外汇应有新的认识.....	(197)

●访抗日军

生与死的角逐

——一幕冲牢记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正是日本法西斯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一百零六位，身囿吉隆坡半山芭大牢狱的反日志士，为了生存，为了伟大事业的前途，冲破了这个统治者素称为陶冶人性，而且认为是最牢固的大牢狱，创下了马来亚有史以来，一幕惊天动地，震撼全马，悲壮伟烈的冲牢史实。

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司令部副队长陈大智，便是这次冲牢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

陈副队长，在一个公事稍微轻松的晚上，把这幕具有历史意义的冲牢故事，告诉了我。

一九四二年，“九·一”吉隆坡石山脚的惨痛事件发生之后，日寇趁着它获得意外胜利的余威，接着便来一个军事大围攻，订下了“十月攻势”之计划，动员了四千兵力，分成五路，向一独的双门单(Serendah)和干增(Kentjin)的根据地，大规模进攻。同时，军事配合着政治，日寇一方面利用敌奸、走狗，四出刺探消息，逮捕民众，屠杀民众，烧毁民房，在民间造成一种极端恐惧的白色恐怖，企图威迫民众脱离抗日军，孤立抗日军。另一方面，日寇又实施经济大封锁，一粒米，一颗盐，都不准输进农村，企图断绝抗日军的粮食，围困抗日军于大山之中，自生自灭。

这诞生不久，还未茁壮强大的“一独”，在敌人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底下，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不作无谓的牺牲，他们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暂时由北向南撤退了。

当时，陈副队长带领的一队人马，撤退到雪兰莪南部的武来岸。在那里重整军容，住了两个月之后，看着日寇的军事进攻，稍微松懈下来，他们的队伍，又向北开回原来的根据地——干增的淡巴影(Tampajang)。

他们的队伍于同年的十二月初迁回原来根据地后，他们的主要课题，即内部加强队员的政治教育，加紧军事教练；对外则展开广泛的民运工作，积极争取民众协助军队，接济军队。另一方面，由于敌奸、走狗、叛徒，密布各地，刺探消息，摧残民运，逮捕民众，屠杀民众，并替敌人四处掠夺人民财物，替

敌人四处征兵，征工；广大的人民，受苦殊深。他们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保护人民的利益，为民除害，是他们的责任，同时为了提高他们队伍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杀狗，锄奸，又是他们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

当时，陈副队长被调任特务队长职务，到离开吉隆坡郊外五、六英里的甲洞去，担任指挥锄奸，刺探敌人情报等工作。

陈副队长被调任特务队长，在甲洞担任工作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了。

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吉隆坡的宪兵，凡逮捕到的抗日分子，都不即杀掉，或即刻判以几年的徒刑，它最初是毒打，拷问，定要迫你承认抗日分子；同时，用卑鄙的方法来利诱你做它的走狗。一些青年，因斗争意志薄弱，受不起金钱与色情的诱惑，且受不得苦，结果上了敌人的勾当，替它工作了，做了民族的叛徒。

敌人也曾经用过这套法宝去利诱陈副队长。但是，陈副队长拒绝了，于是被判入狱，关在吉隆坡半山芭的大牢狱里。

这个大牢狱，在日本法西斯统治时代，简直成为日本法西斯屠杀人民的大屠场。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无辜平民被抓了进去，便在法西斯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如同宰杀牲畜似的被杀掉，把整个半山芭大牢狱的四壁，染成了永不褪色的血染的红墙。

陈副队长被关进牢狱之后，就起了越狱的念头，但这建筑巩固，围墙高耸，堡垒重叠，守备森严的大牢狱，怎样逃呢？爬墙吗？不容易。挖地，凿墙钻逃吗？更不行。

“只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越狱，不但事实做不到，而且也是太自私了；我要使大家都能一同逃出这囚笼……”

“我应进行组织每个囚犯。唯有以集体的行动，统一团结的力量，才能冲出这血腥的囚笼……”

一阵阵暴烈的鞭挞声，掺着一阵阵极凄绝的呼号声，随着空气的流动，不停地在这个偌大的牢狱的空间荡漾着。狱外的噪杂人声，市井的喧嚣，掩不过这惨绝人寰的悲鸣，凶暴的尖叫。

陈副队长坐在潮湿黑暗的囚笼里，自然地脚跟离地，用脚尖顶住身子，双手攀着高悬的窗门铁枝，用狭细了瞳子的眼睛，从紧闭着的窗隙中，卖力地看出室外。在迷糊地光线底下，他常常看见一个个壮健的青年男子，四肢直伸，好像死了一样地躺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也常常看见少女，被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抽缩着，辗转呻吟着。

照监牢的规矩，每天傍晚，有一次集体冲凉的时间，陈副队长就利用这个短促的机会进行工作。

同时，当时的犯人如有家眷的，可以三顿送饭，他便利用了这个机会，用种种避开鬼子检查或发现的巧妙方法，与外界同志们通信，并且将他的意见传送给另一位他认为可以信任的囚犯。

但是，他进行工作的初期是失败了。因为当时敌人正在利用怀柔诱惑的政策，对待“犯人”凡是只要答应替皇军工作的，就无条件释放了。在这个时期对于囚人还相当优待，准予家眷送饭。许多有家眷送饭的囚犯，感觉生活还不差，便以为坐牢不久就可以释放自由，不愿冒越狱这样大的险。有些反而要求说：“你们绝不要干此冒险行动，连累我们”。

事情虽不能马上成功，但陈副队长，并不因此而灰心，打消他的冲牢计划。他加紧做说服工作，慢慢发生了效果，被他

说服而把握过来的人，一个两个，逐渐地多起来了。这些人都做他的干部。

敌人假仁假慈的优待囚人，准予家眷送饭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不久，便藉词禁止了。此后，它对待这群囚犯，一天比一天来得残暴，每天只给吃一小片木茨和一些稀薄如水的粥汤。而且往往无缘无故的把你拉了出来，打得满身红肿，皮破肉裂，然后才像掷死猪一样的把你掷进囚笼里来。

从早到晚，死尸像被宰的猪牛，一具具的从门口抬着过去。

“死亡”是恐怖的。正因为“死亡”是恐怖的，人们便感觉生的可爱。于是，“我们冲出这血腥的牢狱！”便成为每个囚犯的不言而喻的口号了。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希望和平的踱出牢狱，不愿冒冲牢的大险，因为这是生与死的角逐。但死亡威迫着他们，陈副队长针对了现实的环境，谆谆地说服了大家。

陈副队长的冲牢计划终于获得大家一致的拥护了。于是他们分配了工作，开始注意各方面的动作，因为这是一百多人的集体冲牢，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是会失败的。

这大牢狱，分做上下两层。下面的一层，中间是一条宽敞的甬道。甬道的两旁，是一格一格的囚笼。这甬道一直通到大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挂着一个大钟，钟的下面放着一个重约五十磅的大铁锤。只要把这个大门敲破了，大家就可以冲得出去。于是他们注意那个大铁锤，因为它可当作敲碎大门的唯一武器。

每天黄昏冲了凉过后，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是守备最松懈的，这是他们三个月来，每天所留意，且一致观察所得的结果。

经常当他们冲了凉回到囚笼的时候，其他守牢的人都回

去吃饭，只存下一个红头亚三，负责关锁囚门而已。而且在这时候，鬼子是绝对不会有的，只要把这个红头亚三打倒，抢过他的锁匙，把每个囚笼开了，全体“犯人”都可以冲出去的。

冲牢的日子决定了——那是五月里的一个下午，确实的日子，陈副队长说他忘记了。

在决定这个冲牢日子之前，他们先推举了一位身强力壮和身材魁梧的同志，作为打先锋。发号施令之职，由陈副队长自己负责。

那天傍晚，他们冲了凉，回到囚笼里之后，照例那个负责锁门的红头亚三，拿着一大串的锁匙，按着次序把每个囚笼的门，一一锁上。当这红头亚三，挨次锁到那已选定的身材魁梧的打先锋同志的囚笼时，那打先锋的同志，已经有了准备，集中了精神，向那红头亚三扑上去，迎面向他挥了几拳，便把他打倒在地板上，昏过去了。立即那打先锋的同志，抢过那红头亚三的一大串锁匙。不慌不忙，镇定而迅速地把各个不同的囚笼的锁，用着各条不同的锁匙，一一都开了。这是紧张的一幕，每个人的精神，都跟着这打先锋同志开门的紧张情形而紧张了。

各个囚笼的门，都打开了，那打先锋的同志，随即走到牢狱的大门，拿起了那敲钟的大铁锤，用力的向那大门致命地敲了两下，就把门敲碎了。牢门洞开了。

两个站在门外，守备的伪兵，看此情形，想开枪扫射，但说时迟，来时快，被那打先锋的同志，抡起大铁锤，干倒在地上了。

“冲呀冲呀”陈队长下了冲锋令，且自己率先往前冲，其他的囚犯，都跟在他的后面一鼓作气，飞也似的，拼命的往前直

冲。

一百零六个男女囚犯，如同一群蜂，鼓起了双翼，热血在他们心里滚，发出另外一种新生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在推动他们，使他们忘记了一切，只顾拼命的冲，向前冲出去。

陈队长，冲出大牢狱的大门，经过几处敌人的哨兵站，又爬过了敌人的障碍物，朝向那游击队的山头，拼命的走。

经过一个月的访问与找寻，他才找得部队的连系，归到队里去。

一百零六个囚犯，冲出了大牢，但在敌人全面的戒严和搜查之下，结果有二十个同志重新被捕回去，杀掉了。那位打先锋的同志，也成了人们永不可忘的忠贞烈士。

他是冲牢同志的先锋，也是等到所有同志冲出大牢之后，才最后跟着走的一个。他为了全体同志的性命的安全，忘记了他自己，结果，被鬼子抓了回去，在大牢的门前，当场打死了。

冲出大牢生存的八十六位同志，当时，曾誓愿在日本法西斯鬼子被驱出马来亚，和平到来的一天，要在这半山芭大牢狱的门前，为这位忠贞的烈士，建立一个纪念的功勋碑。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写于新加坡，发表在《大战与南侨》。
1970年12月被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选编入《新马华文学大系》
第二集散文[一]）

煤炭山工人的抗日斗争

当我们的考察团(注一)，到了吉隆坡的第三天，就得了一个机会，到马来亚唯一无二的煤炭山去跑了一趟。

抗日军第一独立队司令部的副队长陈大智先生，还特地在他的公事百忙中，抽了一天的工夫，用他的大型轿式汽车，载了我们去。

煤炭山位于雪兰莪的西南，属于万挠区，由吉隆坡到煤炭山，除了公路外，还有火车路，交通相当便利。

打从吉隆坡到煤炭山这一公路，弯弯曲曲，崎岖不平，倾斜得很，兼之三四年未修，鬼子只会跑路，未曾修补过，把公路都